

江苏丹阳北宋邵亢夫妻合葬墓发掘报告

霍强 连小刚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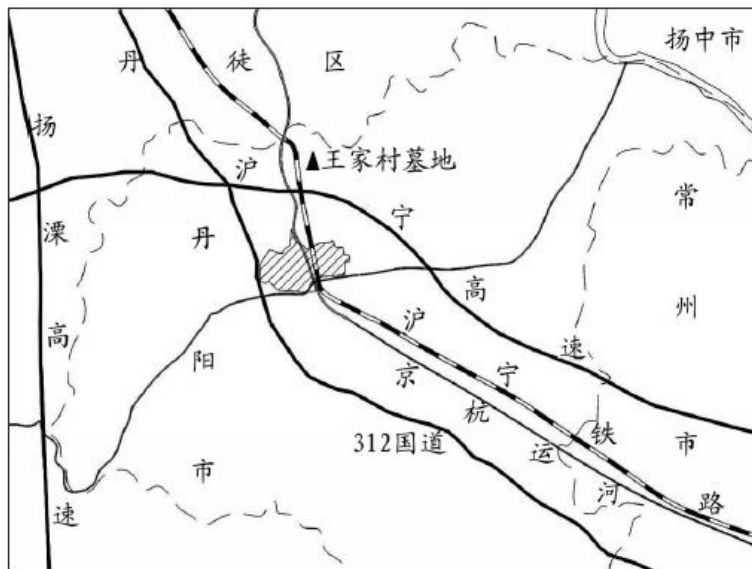
(镇江博物馆 江苏 镇江 212002)

【摘要】：2007年4月，镇江博物馆考古人员在江苏省丹阳市大泊社区王家村发掘一座宋代竖穴土坑墓。墓葬已遭破坏，出土器物较少。出土“（宋故）赠吏部尚书邵公夫人墓志铭”一合，墓主为北宋丹杨郡夫人强氏，夫君为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枢密副使的邵亢。王珪《华阳集》卷三十七撰有邵亢墓志《邵安简公亢墓志铭》。强氏墓志铭可与邵亢墓志铭相互补充、相互印证。

【关键词】：北宋 墓志铭 邵亢 强氏

【中图分类号】：K871.44 **【文献标识码】**：A

2007年4月，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在原来泊镇西北约3公里的王家村开发平整土地过程中，发现了古墓。后经镇江博物馆考古人员实地考察，确认此处为东汉至北宋的墓葬群。此地海拔约25米，是一片舒缓的丘陵岗地；西靠沪宁铁路，南临沪蓉高速公路（图一）。同年4月28日，镇江博物馆开始对该墓葬群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共清理墓葬46座，出土文物百余件。这些墓葬大多数因施工破坏而暴露在外，仅余残壁或铺地砖。从墓葬形制上看，主要为土坑墓和砖室墓。墓葬群中最早被发现的是两座宋墓。一座为单室砖室墓，墓主不详；另一座因有墓志出土，可确认墓主为强氏及其夫君邵亢，系夫妻合葬墓（图一）。现将邵亢及强氏夫妇合葬墓的清理情况和主要收获报告如下。



图一// 王家村墓地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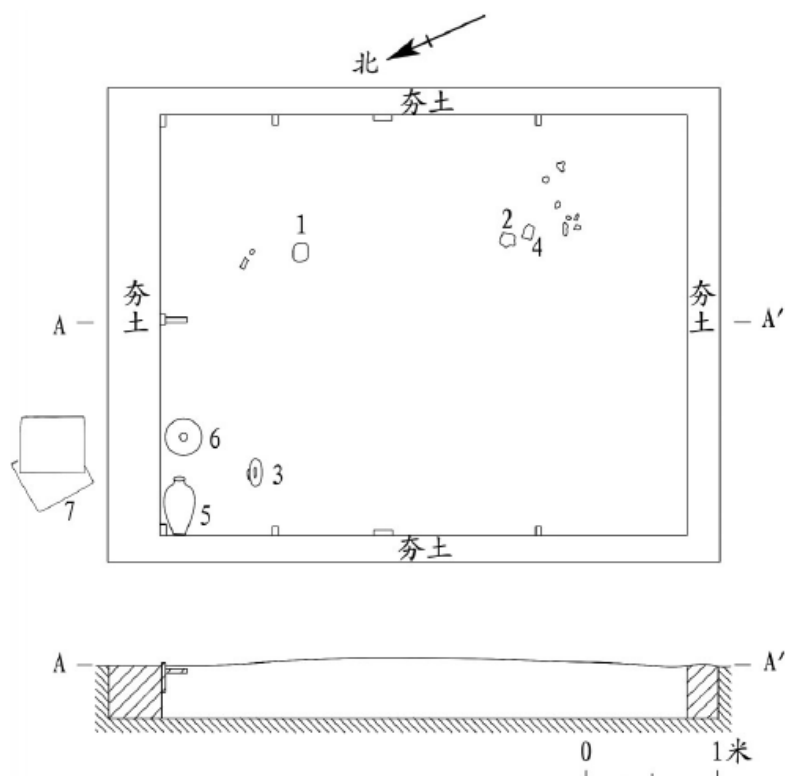
¹收稿日期：2016-12-29

作者简介：霍强（1969—），男，镇江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考古学、文化遗产保护。

连小刚（1977—），男，镇江博物馆文博馆员，主要研究方向：镇江地方历史、碑刻文物。

一、墓葬形制

墓葬（编号2007DWM42）为竖穴土坑墓，平面呈长方形。墓向250°。墓室四壁加筑夯土。墓室内未发现尸骨，仅残存棺木腐朽后留下的痕迹。墓壁残存高度约0.64米。夯土东西两壁宽0.2米、南北两壁宽0.4米（图二）。



图二// M42平、剖面图

1.高足杯 2.粉盒盖 3.器盖 4.碗 5、6.梅瓶 7.墓志

二、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7件，主要分布在墓室的西北角及东壁下。

青白釉瓷碗1件。M42：4，侈口，斜弧腹，浅足，满釉外底无釉，裂纹，白胎。口径11.8、底径3.4、高6.4厘米（图三：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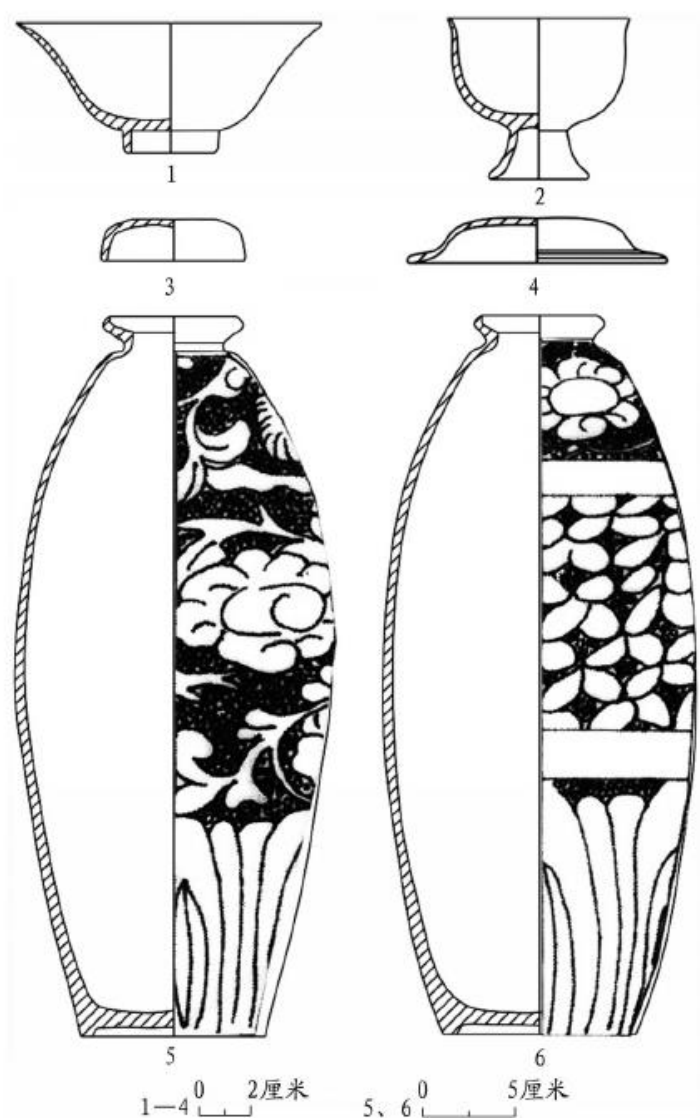
青白釉瓷高足杯1件。M42：1，微敞口，斜弧腹，喇叭形足，满釉外底无釉，开片，白胎。口径6.8、底径3.8、高6.2厘米（图三：2）。

青白釉瓷粉盒盖1件。M42：2，顶面及内壁施釉，沿无釉，扁圆形，顶面微弧，白胎。直径5.2、高1.7厘米（图三：3）。

青白釉瓷器盖1件。M42：3，残。宽沿，顶面圆弧，满釉，白胎。直径9.8、高1.8厘米（图三：4）。

登封窑白釉珍珠地划花花卉纹梅瓶2件。大小、形制相同。圆唇，小口，短颈，溜肩，器身修长，下腹渐收，暗圈足。M42：5，施乳白釉，纹饰刻槽内填褐彩，胎釉之间施白色化装土，外腹上部饰牡丹图案，戳小圆圈为底纹，下部刻莲瓣纹，褐色胎。

口径6.6、底径9.3、高39.8 厘米（图三：5；封底）。M42：6，外腹纹饰分三部分，三者之间有四道弦纹间隔。上部饰牡丹图案，戳小圆圈为底纹；中部饰四叶花图案，戳小圆圈为底纹；下部刻莲瓣纹，戳小圆圈为底纹，褐色胎（图三：6）。



图三// M42出土瓷器

1.碗(M42:4) 2.高足杯(M42:1) 3.粉盒盖(M42:2)

4.器盖(M42:3) 5、6.梅瓶(M42:5、M42:6)

石墓志一合。M42：7，青石质，平面呈正方形。志盖长71.5、宽77、厚13.5厘米，行楷阴刻“丹杨郡夫人强氏墓铭”九字（图四）。志石长71.5、宽78、厚12.5 厘米，志文楷书阴刻，大部清晰，共24行（图五）。录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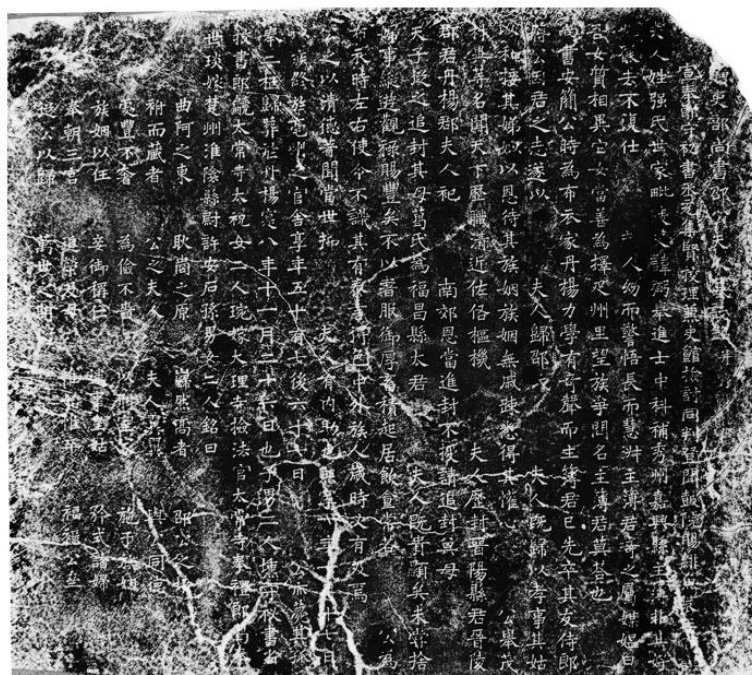
宋故赠吏部尚书邵公夫人墓志铭并序/宣奉郎、守秘书丞、充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同判登闻鼓院、赐绯鱼袋王□撰/

夫人姓强氏，世家毗陵。父讳弼，举进士中科，补秀州嘉兴县主簿，非其好/也，罢去不复仕。夫人幼而警悟，长而慧淑。主簿君奇之，属媒媼曰/：“吾女质相异它女，当善为择疋。”州里望族争问名，主簿君莫答也/。尚书安简公时为布衣，家丹

杨，力学有奇声，而主簿君已先卒，其友侍郎/□公因君之志，遂以夫人归邵氏。夫人既归，以孝事其姑/，以和接其娣姒，以恩待其族姻，族姻无戚疏，悉得其欢心。公举茂/材异等，名闻天下。历职清近，佐佑枢机。夫人历封晋阳县君、晋陵/郡君、丹杨郡夫人。祀南郊，恩当进封，不授，请追封其母。/天子从之，追封其母葛氏为福昌县太君。夫人既贵显矣，未尝舍/妇事、纵游观；禄赐丰矣，不以奢服御、厚畜积，起居、饮食常若。公为/布衣时，左右使令不识其有泰言得色，中外族人岁时必有及焉。/公之以清德著闻当世，抑夫人有内助也。熙宁七年□□十七日，/以疾终于亳州之官舍，享年五十有七。后六十六日，公亦薨。其孤/奉二枢归葬于丹杨，实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子男二人：埙，守秘书省/校书郎；觿，太常寺太祝。女二人：琬嫁大理寺检法官、太常寺奉礼郎葛奉/世；琰嫁楚州淮阴县尉许安石。孙男女二人。铭曰：/曲阿之东，耿岗之原。岿然高者，邵公之□；/祔而藏者，公之夫人。夫人翼翼，与公同德。/处丰不奢，为俭不啬。以刑室家，施于族姻。/族姻以任，妾御称仁。逮事皇姑，矜式诸妇。/奉朝三宫，追荣及母。惟始惟卒，福祿公。/从公以归，万世之□。/



图四// 强氏墓志盖拓片



图五// 强氏墓志拓片

三、墓志相关问题

1. 强氏生平

强氏（1018—1074 年），“世家毗陵”，毗陵即今江苏省常州市，“常州郡号毗陵”^[1]。父名强弼，进士中举，《咸淳毗陵志》卷十一“科目”条下载有“大中祥符元年姚晔榜”“强弼”^[2]。志文载强弼“补秀州嘉兴县主簿”，《万历嘉兴府志》《光绪嘉兴府志》等史籍皆不载，可补史阙。强氏待嫁时，“州里望族争问名，主簿君莫答也”。“问名”本为古代婚仪六礼步骤之一，是女家接受男家的求婚意向后，男家具书遣媒人携雁至女家问女之名、排行第几等，并“授雁，交授书”^[3]。由于强弼未允而未进入婚仪环节，因此志文中的“问名”应仅指求亲之意。“尚书安简公”即邵亢，“字兴宗，丹阳人”，卒后朝廷“赠吏部尚书，即其乡赐以居宅，谥曰安简”^[4]。“家丹杨”，丹杨即润州丹阳县，历史上此县名有“丹杨”“丹扬”“丹阳”三种写法，谭其骥先生认为“杨是本字，阳、扬皆属假借”^[5]。

强弼逝世后，其友“侍郎口公”根据其生前意愿将强氏嫁与邵亢。“侍郎口公”可能为蒋堂。《咸淳毗陵志》载：“蒋堂，字希鲁，宜兴人。举进士。明道初为侍御史。郭后废，堂与范公仲淹、孔公道辅极言不可。坐。黜为河南发运史。”^[6]又“知益州”，后“以礼部侍郎致仕”。据胡宿为其所撰《蒋公神道碑》可知，蒋堂“以皇祐六年三月辛酉考终于吴郡灵芝坊私第”^[7]，“寿七十五”^[8]，可知其生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卒于皇祐六年（1054年）。蒋堂为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徐夷榜进士^[9]，比强弼晚四年中进士。两人属同时代，又同为常州人，且蒋堂长女“适刑部郎中、知制诰邵必”^[10]，邵必则是邵亢的叔叔，因此蒋堂有机会认识邵亢并把强氏许配给他。

据志文，强氏“历封晋阳县君、晋陵郡君、丹杨郡夫人”。《宋史·职官志》载：“咸平四年，从舍人院详定群臣母、妻所封郡县，依本姓望封。”^[11]“姓望”即郡望。宋承唐习，大量的封爵以受封者的郡望地名加在其爵位之前，但“已经不像唐代那样讲究郡望出身”^[12]。按强氏郡望有“天水郡”“丹阳郡”^[13]，并无“晋阳”，此“晋阳”应与太原郡所辖晋阳无关，而可能为当时常州所辖的一个地名，唐时有“杨相如先天中为常州晋阳尉”^[14]的记载。“晋陵”应指强氏的籍贯。“晋陵”即毗陵。西晋时“改毗陵郡为晋陵郡，徙治丹徒县”，“并改毗陵县为晋陵”^[15]。宋时仍名晋陵县。“丹杨”应指强氏郡望，西汉时丹杨郡治在今安徽宣城。关于常州强氏起源，有学者指出“强氏先世溯源于春秋郑国大夫强鉏，世居关中岐陕之间。五代纷争，始有常山太守将容、侍中郎将矢、将石兄弟三人为避乱南迁到杭州、余杭、润州、丹阳，江南强氏皆源于此。”^[16]《万姓统谱》则载南北朝时有“强将容，赵常山太守”^[17]。强将容的南迁时间记载互异，尚需存疑。

2. 强氏夫君邵亢及子孙等情况

邵亢（1014—1074 年），《宋史》有传，神宗朝参知政事王珪（1019—1085年）撰有《邵安简公亢墓志铭》（以下简称《邵铭》）。丹阳邵氏祖居河朔，五代时邵亢的曾祖邵勋避乱南渡、移居丹阳，到北宋时邵亢的叔叔邵饰、邵景先、邵必三人先后入仕，家族逐渐显贵。

关于邵亢的科举、仕途，志云：“公举茂材异等，名闻天下。历职清近，佐佑枢机。”高度概括了邵亢一生的历官情况。关于邵亢制科及第的具体年代，诸籍未载，《宋登科记考》将其列入“阙年制举登科若干人”^[18]中。宋代科举分常科与非常科两大类，常科有进士、诸科、武举，非常科有制科、童子科。茂材异等科即属制科中的一种，置于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以待布衣之被举者”^[19]，考试方法是“先上艺业于有司，有司较之，然后试秘阁，中格，然后天子亲策之”。宋代制科取人较少，故以寡为贵，选拔尤精，应试的天下才杰“或起之山林，或取之朝著，召之州县，多至大用焉”^[20]，因此备受士大夫的推崇。

“历职清近，佐佑枢机”应指邵亢居官清贵近要及担任枢密副使等事。邵亢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中央和地方间迁转，官至号为“执政”的枢密副使。《邵铭》载为“公始以羁孤自拔，及历事三朝，位二府，显矣。”^[21]北宋时，“馆职为

引人瞩目的名流之选，一经此职，仕途通畅、提拔迅速”，故“文臣以能博得馆职为荣”^[22]。阁职则是北宋储材及遴选高级官吏的重要途径，阁臣侍从皇帝左右。邵亢在英宗朝受到信任、宠遇，曾任“直史馆”“同修起居注”“知制诰”等馆职，英宗还任命他为“颍王府翊善”（颍王即后来的宋神宗），“赐三品服”。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神宗即位后，邵亢“迁龙图阁直学士、兵部员外郎、同知礼部贡举”；七月，“以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23]；九月，“除枢密副使”^[24]，“迁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枢密直学士”均为阁职，表明邵亢此时为神宗信任的近臣。枢密院是宋朝掌管全国军务的最高机构，简称“枢府”。神宗元丰改制前，“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25]。邵亢任枢密副使的时间不长。一年多后，邵亢因“论事与时多不合”^[26]，“无大补益，帝颇厌之”^[27]，遂称病请辞，但神宗“累诏不许”。熙宁元年（1068年）十二月，邵亢“以资政殿学士、给事中知越州”^[28]。神宗此时仍对其礼遇有加，“遣使就第，所以劳存之良厚。”熙宁五年（1072年）春，神宗经过东宫，“邈然思旧臣，特迁礼部侍郎”。熙宁七年（1074年），邵亢“又徙亳州”，神宗“尝遣内侍冯宗道谕公将复用”，但此时邵亢因病发而卒于亳州。

志云：“祀南郊，恩当进封，不授。请追封其母。天子从之，追封其母葛氏为福昌县太君。”此事亦载于《邵铭》：邵亢“同判吏部南曹。改太子中允……俄丁母忧。愿还一官以追封其母。朝廷许之，封其母孝感县太君。服除，再以为太子中允。公固辞。除集贤校理，判登闻鼓院，为群牧判官。”按邵亢“同判吏部南曹”在至和元年（1054年）^[29]，“除集贤校理，判登闻鼓院，为群牧判官”在嘉祐元年（1056年）^[30]，此事应发生于这两年之间。《邵铭》称邵亢母为刘氏，追封建安郡太夫人，王珪《华阳集》所载《丁忧人邵亢亡母刘氏追封孝感县太君制》^[31]，亦称其母为刘氏，追封孝感县太君。今应以志文为据纠正史误。

邵亢夫妇逝世后，神宗为其家人在丹阳建造宅第，又于其墓附近敕赐功德坟寺。《光绪丹阳县志》载“邵安简祠，在耿冈。宋熙宁中敕赐祠地，场宇二百六十五号，地二十一亩三分二厘三毫”^[32]。《民国丹阳县志补遗》则载：“孝感寺，县东北十五里耿冈。宋枢密邵安简功德院。熙宁间敕赐善庆孝感禅寺，僧无业建。明正统、景泰间相继增修。”^[33]可知孝感寺在明代前期尚存。邵亢夫妇合葬墓附近曾发现一尊石马，可能与该寺有关。史载：“龙图阁直学士邵必，通判邵约史，枢密使邵亢墓俱在耿冈。”^[34]据此推测，该墓附近的另一座宋墓墓主可能为邵必或其子邵约史。

关于强氏和邵亢夫妇子孙情况，志文载其有二子二女，长子邵垞为守秘书省校书郎，次子邵觿为太常寺太祝，长女邵琬嫁与大理寺检法官、太常寺奉礼郎葛奉世，次女邵琰嫁与楚州淮阴县尉许安石。孙男孙女各一。《京口耆旧传》中有邵垞、邵觿的传记^[35]。邵垞，字伯友，“元祐初，曾布经略河东，辟为属，掌文翰”，后“出知婺州金华，救荒有名。通判滁州，卒于官”。邵觿，字仲恭，“登熙宁六年进士第”，“神宗亲擢提举开封府界常平”，哲宗时“入为开封府推官”，后任郑州知州、陕西转运副使等职，徽宗时“除直龙图阁，知秦州兼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累官至显谟阁待制。葛奉世在史料中有零星记载，“（熙宁六年）八月壬申朔”，“杭州钱塘县丞葛奉世为太常寺奉礼郎，并充大理寺详断官”^[36]。许安石，开封襄邑人，大中大夫许拯四子^[37]，宋代诗论家许颢（字彦周）之父^[38]，元祐中为深泽令，“修理学校，民被其化”^[39]，元丰间对深泽水患“治之有方”，迁黄州麻城县令，后调江东漕。

四、结语

该墓因遭到严重破坏，无法获取完整的信息。从其墓葬形制来看，竖穴土坑墓虽然在南方地区很常见，但官员及家属采用这种葬制的比重较小；就镇江地区（宋时辖丹徒、丹阳、金坛三县）而言，考古发现的竖穴土坑墓亦较少。葬于镇江市南郊的章岷^[40]（1002—1071年）与邵亢卒年相近，其卒前为“光禄卿”，官阶低于邵亢卒前的“礼部侍郎”，但其墓为石顶硬壁竖穴墓，出土器物（包括定窑和景德镇窑瓷器）也较本墓精美。这种情况可能与强氏生前不事积蓄，“处丰不奢，为俭不啬”有关。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该墓墓壁四周加筑了夯土，且夯土四壁等距离镶嵌有大小相同的铁板，这在镇江地区的宋墓中尚属首次发现。这种做法可能与安置棺木有关。

《强氏墓志》的出土，为了解和研究强氏及其夫君邵亢的生平、家世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志文所载邵亢科举、历官等

内容可与《宋史》《邵铭》等文献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拓宽了研究北宋名臣邵亢的资料基础。同时，志文中涉及的常州、丹阳等处地名，亦为认识该地古今地名的变迁提供了线索。

参考文献:

- [1] 宋·史能之纂修：《咸淳毗陵志》，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方志丛刊（三）》，中华书局1990年，第2948页。
- [2] 同 [1]，第3045页。
- [3] 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三《婚仪上》，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9页。
- [4]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10337页。
- [5] 谭其骧：《〈宋州郡志校勘记〉校补》，《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0页。
- [6] 同 [1]，第3119页。
- [7] 宋·胡宿：《文恭集》卷三九，故宫博物院：《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第35册，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19021页。
- [8] 同 [7]，第19023页。
- [9] 同 [1]，第3045页。
- [10] 同 [7]，第19023页。
- [11] 同 [4]，第4085页。
- [12] 胡勃：《〈汉语大辞典〉封望条释义辨正》，《辞书研究》2014年第5期。
- [13] 田学超：《中华百家姓》，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第439页。
- [14]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五三三《谏诤部·规谏第十》，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074页。
- [15] 同 [1]，第2962页。
- [16] 吴建华：《强以德与元代无锡地方社会——家族史、地方史和社会文化史的一个方面》，高燮初主编《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0页。
- [17] 明·凌迪知：《万姓统谱》第一册，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等编纂《中华族谱集成》，巴蜀书社1995年，第796页。
- [18] 傅璇琮、龚延明、祖慧：《宋登科记考》，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932页。
- [19] 同 [4]，第3647页。

[20] 同 [4]，第3645—3646页。

[21] 宋·王珪：《华阳集》卷三七，故宫博物院编《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第36册，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19706页。

[22] 龚延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667页。

[23]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1）》，巴蜀书社2003年，第807页。

[24] 同 [4]，第5484页。

[25]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第523页。

[26] 同 [21]。

[27] 同 [4]，第10337页。

[28] 同 [4]，第5484—5485页。

[29]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2）》，巴蜀书社2003年，第378页。

[30] 同 [29]，第655页。

[31] 同 [21] 卷三一，第19642页。

[32] 清·刘诒修、徐锡麟纂：《光绪丹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3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8页。

[33] 胡为和修、孙国钧纂：《民国丹阳县志补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3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47页。

[34] 同 [32]，第124页。

[35] 宋·刘宰撰，王勇、李金坤校证：《京口耆旧传校证》，江苏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8—89页。

[36]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六，第18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987页。

[37] 宋·陆佃：《陶山集》卷一四《许侯墓志铭》，转引自傅璇琮、辛更儒主编《宋才子传笺证·南宋前期卷》，辽海出版社2011年，第255页。

[38] 李舜臣、欧阳江琳：《许顗生平事迹考述》，《学术交流》2007年第1期。

[39] 清·李鸿章等修、黄彭年等纂：《光绪畿辅通志》卷一百八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63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28页。

[40] 肖梦龙、刘兴：《镇江市南郊北宋章岷墓》，《文物》1977年第3期。

